

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社会的转型

〔韩国〕李相沃

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角度探讨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体系中所发生的诸问题,从经济开发、社会发展的诸环节、政治生活、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体系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对策。本文认为,整个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受到冲击的社会各个体系主要应由国家为主导来计划和安排。

作者:李相沃(Lee, Sang-Ok),男,1958年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

本文分析中国政治体制范畴之内经济社会体系。这是指与政治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社会体系是市民社会赖以维持正常活动的生活舞台,并作为其生存和自由的表现。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体系有着共同的运作规则、历史和价值观。两者可以说是一种命运共同体。

一、经济开发

在中国,经济开发是国家追求的最大而最紧要目标。1978年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上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始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们(党)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①这不仅是审时度势的结果,而且是时代的产物。11届3中全会公报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②为了开发经济,必须转换政治结构的功能。这种转换有两条可选择之途径:一是强化国家能力使它适当地做到健全政治与社会两结构功能的角色;二是完备政治与社会两结构之间或者各个结构内部程序和规则的层次。

有关发展中的国家能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解释:第一,马克思的发展论及继承它的依赖理论和当代第三世界主义的理想主义(The Idealism of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ism)理论。此论主张,为了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单靠社会主义是不充分的。马克思提出在短期内资本积蓄将会与长期“渐次性”形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互相妨碍性。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不可避免的不公正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形态和次序的变化。根据这观点进一步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主张在现代世界,系统的资本积蓄和工业化的过程是:无论其体制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

① 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② 同上。

义,其国家和官僚体系都能够具有权威性和广泛性来对经济体系行使关键性的角色。中国与日本、韩国、苏联(或俄国)一样,在或有或没有国内或国际资本家阶级的合作之下推动经济发展。而且,它们对人权或市民自由等传统自由或社会主义概念几乎不予以注意,只有关心经济发展的方面。

第二,现代化理论的分析架构。此论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和能力,其官僚机构和渗透技术的问题。这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韦伯(M. Weber)和新古典学派的混合。现代化理论把私人 and 公共角色分化的程度;官僚制度官员的态度、结构、自主性和可靠性;国家权威的程度和正统性及其管辖的范围、技术的掌握和信赖性的诸特性叫做“现代化”过程,也是社会广泛的“政治文化”特性。中国是以这些特性作为创造有效率发展必要条件的最佳例子。最近中国推行公务员制度,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适度分开,个人和企业权利的扩大以及行政信任度的提高等一系列措施是这方面政府努力的表现。

第三,战略,即政策的选择理论。首先,有责任有能力的精英分子或集团在现有的历史、制度及社会环境之下,对特定的政策作出选择。然后,人民对特定决策者所选择的过程以及其政策进行评价。这一连串过程涉及到国家制度的能力和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制约下,如何成功地实行该特定政策的问题。精英分子(尤其是在权力核心中的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及其出身背景也属于此范围的主要变因。不过,最后产生出来的政策本身仍然带有确保特定的利益,抚慰具有影响力的诸政治势力,以及维持权力对政治体制控制能力等性质。从此种观点看,中国所采取的不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标准方式”,而是“亚洲方式”,即“渐进主义自由化模式”。联全国经合组织1994年4月出版的《从改革到增长》中说:“亚洲方式有助于发展效率较高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建立面向市场和适应市场的企业,有助于刺激供求双方作出积极反应,无需人们勒紧裤带,从而减少了政策通常带来的社会震荡。”^①

“亚洲方式”主要探讨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问题。这主题是1950年代和60年代初,结构主义作为其主要的分析方法。结构主义者说低度经济发展的主因是在于市场的失败,应由国家担负重任来更正它。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新古典主义者反驳结构主义的论点大约如下三点:一,国家对于代替进口产业进行积极干预促使它快速发展,然而,此种快速发展的政策反而产生了毫无国际竞争力并且不断要求补助的一些非效率的企业单位。二,过度的政府干预容易使本应热心于经济效益方面的企业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于投入“寻租”活动。三,实证结果表明,像亚洲四小龙等国家的经济成就是通过对收入的比较平等分配、市场指向以及强有力的私营经济所主导的外向模型而获得的。

对于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国家主导模式和新古典主义者的自由市场导向,制度主义者认为都是反历史规律的,而且是误导的。他们提出为了推进快速高效产业化,自由市场导向应与国家主导政策适当混合。他们还说以政治及制度的装置与此混合相互配合。精英官僚与私营企业彼此持有强烈的磋商和合作意愿。所以,他们寻求建立制度与组织上赖以密切联系的渠道。受控市场论(the governed market theory)说明了以国家维持其高投资水平为理论核心的第三世界各国高度产业化的优先战略。国家具备的强大能力,通过操作价格、诱导投资以及实施对财政体系的严格统制,全国实行产业化的政策和防止腐败的措施。官僚高度自主性和公共—私人领域的合作是制度主义者所主张的两大重点。在决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国家和企业

^① 陈如为:《创造奇迹仍有难题前景光明—综述一九九四年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说》,《瞭望》,第一期,1995年1月2日,第16页。

精英之间合作的制度化造成把大众集团和劳动阶级排除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现象。这是亚洲四小龙等国家的模式,即权威式合作主义(authoritarian corporatism)。

中国的经济开发是否与中国社会转型形态构成矛盾关系?经济成长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吗?为了有利地创造两者协调一致的条件,政策应放在哪一些方向?下面,就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分为几项探讨。第一,经济发展应该把解脱贫困作为第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发展的战略应从使全体国民从绝对贫困下解放出来的角度决策和实行。这是健康培养市民社会和解决结构矛盾的第一步。中国政府通过人口、粮食、产业结构调整等宏观政策,一直努力解决人民基本温饱问题。但是,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使全体人民不能均衡得到经济发展的直接实惠。对此,国家统计局的国家发展报告概括指出: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以消费品生产与市场容量不相适应为特征的消费需求约束矛盾犹在,工业消费品依然边生产边积压,产销不衔接问题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以一些重要生产资料货紧价涨和铁路运输缺口拉大为特征的资源约束矛盾再度出现…此外,农业基础尚不牢固。集中表现在,农田被占数量大,耕地面积减少过多;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到位率低、缺口大、卖难问题更加突出;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农业比较效益趋于下降,农民务农积极性受到挫伤。”^①

第二,经济发达或富裕与平等的关系。在现实的中国,有关这方面应该注重的是分配和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向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那么,如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与收入不平等的矛盾现象如何解决呢?这从政策杠杆方面可能得到解决。有关此,正在争论的主题是:“价格、工资、金融和利润等杠杆将主要与市场分配机制相联系,主要服务于刺激效率、平衡资源、积累资本等目标。而税收、财政、福利等杠杆则主要与政府分配机制相联系,主要服务于公正和稳定等目标。”^②所有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多种产权的形式适应于社会化生产。“所有制形式必须保证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必须适应在市场关系中明确界定市场主体的财产所有权这一基本要求。”^③

第三,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国家统计局对此具体举例说明:“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在10%以上,经济发展处于超高速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广东、福建、海南、广西、上海、河南、河北、江西,其增长速度在13.3—27%;高速成长的有吉林、辽宁、天津、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内蒙古、新疆,其增长速度在10.2—11.9%;中速发展的是云南、贵州、黑龙江、宁夏、青海、甘肃,其增长速度在6—9.1%。沿海明显快于内地和边远地区,西北地区发展相对较慢。”^④目前在中国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容易变为地区或者是省份之间不协调。“地方保护主义”是其一例子。为此,需要如下措施:一,中央政府应利用必须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如采取集中管理和协调跨省贸易利益,废除不公正的国内贸易条款,统筹规划产业结构,对内地落后地区给予政策优惠,平衡地区发展。二,制定有关商业法规,健全市场机制。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四,各省在内外贸易上彼此协调,使国内市场一体化。

第四,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参与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市民社会逐渐趋于行使其正常功能,政治参与等各种要求也跟着出现。政府要适时准备疏导其参与要求的渠道且关注其制度化的方向。这可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是对公民教育和宣传,让他们能够适应政府所指向的价值世界。

① 国家统计局编:《'93中国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② 王珏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0年(1949—1989)》第四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③ 同上,第239页。

④ 国家统计局编:《'93中国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其二是通过建立合理的模式吸收公民意见并疏通让他们作出反应的渠道,以作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二、社会结构

中国政府冲破意识形态的约束,开始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个社会发展,这对中国社会结构来说,无异是一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革命。就是说,被政治权力与组织所淹没了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存在将展现其崭新的面貌。社会结构形态的特性和构成等将作为国家改革成败的基础因素之一,这与民主化的范围和程度有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在现阶段中国市民社会培养的问题上,国家的政治和政策起重要的作用。

政治社会学者们主张将社会诸势力与制度形成互相关联,国家的政治才更好理解。社会福利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分裂和不平等是决定该社会政治体系的背景要素。经济和社会条件与民主和权威或民主形态和政治稳定在政体(polity)的关联之下形成因果关系。不过,一般来讲,在决定该社会的民主水平方面,社会结构较经济、文化(指包括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和种族的同质性等)来说更是主因。政治体系只有作为取得该社会目标的工具时,社会成员才认同它。由于民主本身体现某种价值,其价值通过有利于塑造该社会成员民主意识的社会产品形式,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有引导作用。所以,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一时的经济困难,纠正政府的失误或者发展与稳定在意见上的分歧等似乎都可成为政府领导采取改革的理由。不过,单讲“破旧立新”并不是改革的充分理由。改革最主要的理由是唯有改革才能够“有效地”动员所有可能利用及分配的资源。改革产生的经济发展计划,应使掌握主导权的国家能力能够消除国家行为中可能引起的阶级矛盾,并且使对政策过程能行使影响力的社会诸势力和集团,在其能力方面趋于平衡。

在中国,以经济开发带头的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给推动此种“发展革命”的主导者提出了进退两难的难题;一方面,政权的掌握要继续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抓住发展带来的不可预测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所以,如何折中或调和来自这两方面对现有政治体制构成的潜在威胁,将成为对推动力量本身限制的一个突破。

中国政府宣布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为此整个社会体系结构的重新塑造。同时,意味着具有自主性及自发性的运作体系的产生。这种体系与政治体系保持相对独立。至文化革命结束为止,真正的市民社会并没有能够存在过。社会各个成员,以政治成分被分类,这样便判定了他一生在社会内得以活动的范围和限制。这里不可能有身分的变化或者是活动领域选择的自由。自解放至文化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再构成方面,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反而,出现了整个社会结构和功能方面的退化现象,即次级结构之间关系的失调和单纯性及未分化,物质资源生产及分配的低水平,极端思想和缺乏规则的无序状态等等。这一段弯路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社会进程中的一大遗憾。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尝试,新中国的政治,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作为自己发展的历史借鉴。所以,中国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势必带有某种探索性。

走向民主社会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改革方向应该根基于国家职能的转变及对社会过程的认识。民主和其价值应以社会整体(social body)的重新统一和再组合作为其基础。政党内,由于制度和大众处于相隔离的状态,所以,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应专心于组织“民主辩证法”(“democratic dialectic”),并且避免将政治放在“专家”手里而使国家成为外在于(something

external)社会过程的独立体系。政党毕竟是一支强大的组织。所以,它有能力把这种大众运动带进政治体制之内。这样才能保障国家与社会体系活动范围的一致。经济开发过程中中国政府可能会面临社会结构受冲击所引起的危机。这些危机包括:一,体系性限制。以中央计划经济为主的体系并不能适应和适合于更发达的经济形态所需要多样性资源的计划及管理体系。计划体系毕竟影响到一般大众的经济生活,经济水平一旦提高,大众对非必需品消费的需求随着提高,对物质上供应不足的不满极容易引起大众的意见。二,发展的比例失调。社会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农业生产的相对薄弱及由此加剧的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及由此加剧的地区社会发展差距扩大;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涨幅提高,尤其是各类服务费用价格上涨过快及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群体在享受社会服务方面的差距扩大;社会分配的群体内平均主义与群体间差距悬殊,尤其是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关停企业职工收入偏低及由此加剧的社会心态不稳定和人才非合理流动;一些社会丑恶性现象和思想道德问题,如腐败、黄祸、违法犯罪等,虽然尚未造成全局性影响,但潜在的危险性在加大…等等。”^①

与这些危机的妥善解决有关,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考虑如下三个环节;第一,政策的准备。为消除社会结构性矛盾,不平等以及非均衡,政府在教育、社会福利、民政、环境保护、卫生、文化及就业等社会诸方面,要适当地做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发展政策的实行。第二,观念的转换,即社会重组和社会秩序调整并举。随着经济方面的发展,社会成员和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位置正在重新确定,原有的社会秩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具体秩序)将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重新调整并确定。所以,需要使民主化教育得到实施,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让他自觉提高自己存在的社会意义。教育其认识民主化社会内的角色、义务及权利。第三,大众参与政治的问题。社会发展的主题不得不涉及到社会诸势力的均衡问题,这是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市民社会和参与领域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换言之,在此,需要探讨阶级的实际运作(practice)形态和它们对国家的影响;在社会结构和市民社会层次上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政策计划有关联的决策过程当中,不同社会集团参与的程度和形态等。每个社会成员按照他所属的集团性格表现出来的相异的方式以及集团内利益表达的能力和组织自己成为利益群体的水平,是关系到国家全盘发展成败与否的重要因素。所以,政策的形成一定要考虑来自社会诸结构的要求。同时,社会诸集团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参与途径的制度化是现今发展中的中国所绝不能忽视的事情。

三、政治生活

中国的政治生活可分为如下三方面。即,改革、宣传和现在社会水平。这三种要素的互动关系将决定今后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第一是政府的社会改革对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中国政府的整个社会改革计划主要是从经济和政治方面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即面临着一种危机,文化革命时的政治体制是“一种体制集权程度极高,并带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带有很浓重的个人色彩,和打倒一切中间管理层次。所以,是与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并存的”体制。^②所以,时代需要对文化革命的措施来一番清算。这表现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和平反政治冤案等方面。

^① 国家统计局编:《'93中国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② 郑谦:《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三),党史通讯,1987年第11期。

政治改革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政府工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法制建设等制度性措施和确立党内民主、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各级人大功能的强化、地方及基层政治层次运作的推进、选举制度、诸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功能强化等政治运用方面的改革。政治功能改革可分为三方面：权力机关，其执行机关和两者之间的渠道。在权力机关方面，其权利在逐步扩大。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种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①虽然，这些纯粹是保障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福利和利益沟通。职工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功能的强化从制度和法律上得到了体现，陆续发表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1986年9月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及1988年4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1994年9月中共中央第14届4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党内民主集中制，基层组织建设和选拔干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和1994年10月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等。

第二个中国政治生活的方面是宣传。这主要表现为防止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弊端的污染和保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纯洁性。1986年9月中共12届6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内容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教育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以及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1994年8月，进一步的措施《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出台。在这里，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等的字句不再出现了，代之以强调民族精神、统一战线、爱国热情等，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国情作为其教育的素材，其内容是历史、传统文化、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国情、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国防和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等。

第三个中国政治生活的方面是现在的社会水平。改革开放15年来，在中国社会结构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村的公社制和城市的单位制经过其角色的初步分化，其与上级结构关系性质的变化，各种利益集团的产生，利益的多样化和明确化等的过程；在个人方面，其身份、等级等各种约束因素得以缓和或改善。由于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劳动工资方面的改革，在社会上形成了大量的、自由流动的私人资金。这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改革。从而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社会的形成。这表现为如下三方面：一，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二，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形成。现在整个中国社会私人的储蓄、债券股票及手持现金，已达18000亿元，相当于国有资产的一倍半。1989年底，整个中国城镇的个体劳动者为648万人。到2000年，中国所有制结构将形成由全民工业、集体工业以及城乡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三分天下”的格局。三，民间社团组织化程度的增强。主要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文化体育协会、学术性的学会或协会、基金会、联谊会以及各种名目的俱乐部等。在一些调查中国人民政治行为的一些报告中，调查者按照各自的标准，测定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实际情况。按中国的民主化程度，算出来的大致数值是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左右。在这些数值中，中国学者所测定的结果是百分之四十，外国学者所测定的结果是百分之二十左右。由此可见，外国学者对中国政治民主水平的评价比中国学者的评价要低得多。不过，这些数值在现实中国政治中并不见得有很大的意义。关键的是，到底多少数值作为执政党所能承担或者是容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12页。

忍的基准,和如何调和政府能力和逐渐增大的社会内部诸势力之间的关系。

四、文化和价值观

文化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社会体系。所以,几乎所有政治变革的第一步计划是打破原有的政治势力或力量及意识形态。对此,最普遍常用的方式是迎合主体文化的基本需求,即回到根源层次或者是推出崭新的价值体系。前者是传统主义者或文化还原主义的角度,后者是革新主义或政治管理主义的立场。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困难或失败的原因究竟应归咎于文化上的障碍抑是政治上的问题?这问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即文化与政治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文化位于社会深层的体系,而政治是其上层建筑。文化体系里应该包含政治结构,而政治面对文化就好象面对人民一样。政治的运作应以人民所保持的主流文化的导向作为其政策的基本导向。

传统中国的政治对文化采取一体化的模式。文化与政治不可能各自独立存在。每一朝代的政治领导包括皇帝在内都与其说是行政家不如说是帝国文化的守护者或传教者。事实上,区分中国与非中国最重要的标准不在于领土或国民意识而是文化上的认同。过去两千年,中国为了生存一直追求文化的强制统合。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和西方文化三种异质性文化互相竞争的局面。不过,由于官方对这三种“文化的意识形态”所持的畸形的偏好和无知的嫌厌,所以,这对建树和发展文化的正统工作方面构成障碍要因。30年代蒋介石政府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失败,说明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单方面强制不再通用于被统治者,他们所推出的回归“传统”明显是过时性的。

毛泽东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意味着对抗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选择文化的标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此标准,旧观念、思想及习惯应被排除掉。这时期政治领导的任务是用现代技术、巨大的行政机构及组织力量维持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大众及要求服从。这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机构、舆论媒体、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甚至于业余活动等方面的严格管制。文化革命是通过国家的权力和群众运动,消灭掉规模庞大的旧封建遗习和资本主义思潮,是借用正统新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结果。

毛泽东去世后的自由化给传统文化带来很大程度的复活。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得以开始引进。不过,这些都必须通过官方新的评价标准才可进入。政治领导对新形态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并不满意。随着经济发展,文化的多元性是其必然的结果。现在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文化政策上的难题大致如下几项。第一,文化的多元化和政治的一致性:一方面,需要细心、有意地加强宣传工作、理论工作,树立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规划等。并规定其范围。目前的审查标准是:1. 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即政治上、思想上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 各部门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3. 国家颁布的法律、条例和命令;4. 社会道德和伦理要求。^①另一方面,需要大力扶持人民大众的一般文化事业。即,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市场的培育,文化法制建设,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等等。^②第二,与国家发展相配套的文化措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文盲的消除,人口政策,体育的培养等等。这些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同时,这些文化政策也是为了有效地宣传和动员所需要的资源。第三,作为国民和谐和政治统一手段的文化:形成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文化形态,是对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整体所面临的重

① 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② 庄正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四十五年》,新华月报1994年12期,第165页。

要课题；包括各民族之间矛盾的解决，照顾民族特性和福利方面，及宗教问题。第四，基层文化和农民文化水平问题；“1. 制定和贯彻执行农村文化建设政策，要调动农民从事文化建设的积极性，2. 应该是社会教育工作，内容包括科学的、爱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要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特色的内容。3. 由宣传、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各部门统合管理。并由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主持协调工作。4. 社队文化工作人员，一般采取业余形式，不能由国家包下来。5. 广泛推行农民集资办文化的办法。”^①

在当前中国的文化整合的情况之下，如何运用政治软体（政治关系的质部分）和政治硬体（制度和结构）的适当配合来处理诸如中央集权化和地方分权化，领土的维持和控制，软权力的整合（影响、说服、刺激、勉励）、合法性及弹性等等，这些都是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艰难的工程。

责任编辑：范广伟

（上接第 49 页）

但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至少以下两个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中巧妙地把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结合起来，发挥了有效干预作用。二是文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好地建立起了保持传统文化特色和大胆采借西方先进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特别是民族自强意识和忧患意识，构成东亚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东亚文化中重人文的特点也使这些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明显高于经济发展指数。东亚各国和地区发展的经验说明，在当今的国际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的因素是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这就要求高度重视人文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分析。比如，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资源条件好，科技力量雄厚，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这种发展相对迟缓的现象被称之为“东北现象”。要破译“东北现象”的密码，恐怕重要的方面要从非经济因素方面去寻找。比如，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刚性的高度集中的官本位体制制度因素，人的素质特别是陈旧的观念素质因素等等。这些因素使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主体能动性资源十分匮乏。如不大力改变社会、人文资源落后的状态，不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和主体能动性，“东北现象”是不可能很快改变的。

所以，从综合发展动力观的角度说，为了促进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学会把“正弹琵琶”和“反弹琵琶”结合起来。所谓“正弹琵琶”，就是抓好市场经济机制的培育，抓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从正面把经济带动上去；“反弹琵琶”就是从社会、文化层面入手，通过抓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动力因素，从反面把经济推上去。有人说，具体的思路应是“文化引路，教育奠基，科技开车，社会制衡，经济腾飞”，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我国来说，在经济发展中注意“反弹琵琶”，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发挥和解放人的主体能动性，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责任编辑：王 颀

^① 路逸，张晓林：《当前农村文化工作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1983 调查和研究》，北京，中共党校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版，第 102—104 页。